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推荐用书



翻译专业必读书系

总主编 谢天振 柴明颀

翻译心理学

Psychotranslatology

陈浩东◎等著

本书从心理学的微观角度探索翻译本源的必由之路，又创新地把跨文化心理翻译活动纳入研究，这种宏观的视角能更好地将翻译研究与人类文明更相联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兰州大学教育部“985 工程”建设项目
翻译专业必读书系

翻译心理学

Psychotranslatology

陈浩东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心理学/陈浩东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

(翻译专业必读书系)

ISBN 978-7-301-21953-9

I. ①翻… II. ①陈… III. ①心理学—翻译学 IV. ①B84 ②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1748 号

书 名:翻译心理学

著作责任者:陈浩东 等著

责任编辑:李 颖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1953-9/H·323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evalee1770@sina.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350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项目合作人：李 莉(深圳大学) 王 颖

宋 萍 孙 玲 何爱平

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恢复工作，开始在河南安阳教育学院教授英语，遇上了一群考分不错，却由于各种原因未被本科院校录取“流落”到此的七八级专科生，其中的佼佼者、留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本书的作者，后来考上研究生走上深造之路，现为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的陈浩东同学。勤奋好学、志向远大、禀赋颇高、年轻有为，是我当时给他们的评价。三十多年过去，我已是耄耋之年，现很少做翻译研究了，但仍致力于东方辩证法的研究，因为我认为人类思维的最高认知形式是哲学，而《易经》中所蕴含的哲学原理正是探秘人类思想史、文明史的指路明灯。十多年前，我探究了人类思维发生模式，辑于一书，阐明了我的思维模块假说。现在看来，正是语际翻译给了我探究人类思维模式和哲学的基础。语言翻译是大脑中受控于思维规律的符号运动，所以，研究语言翻译必须寻根溯源研究思维的模式。我在本书稿中看到了正确的研究思路，一条从心理语言学的微观视角探索翻译本源的必由之路；同时，本书创新性地把群文化心理跟翻译活动结合研究，这种宏观的视角能更好地将翻译研究与人类文明史相联系，呈现翻译的历史和现实价值，从而实现建立《翻译心理学》的意义。

人类文明的沉浮与其哲学认知模式息息相关。众多古代文明的衰落其实是其哲学的内在缺陷所导致，只有东方辩证法才是人类认知的最高、最正确的认知模式——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又一次的复兴证明了这一点。我的人类文明观要向世界宣告，要传播到文明世界每一个角落，让人类学家们知道，让东西方文明人知道。相信中国翻译界前辈们可以帮助我做到！

是为序。

张 今
于开封
2012/2/4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学科范畴与研究任务	(1)
第二节 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	(2)
第三节 翻译心理学研究任务与方向	(3)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
第五节 翻译心理学的未来	(13)
参考文献	(14)
第一章 翻译思维机制：符号的认知意义	(16)
第一节 语言、思维与现实	(16)
1.1 语言与语言学	(16)
1.2 思维	(19)
1.3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21)
第二节 信息加工的大脑机制——语言编译机制	(24)
2.1 大脑——语言信息加工处理的基地	(24)
2.2 语言编译机制的形成	(27)
2.3 语言编译机制的操作过程	(28)
2.4 人类的记忆——语言认知加工的核心	(30)
第三节 语言符号的认知意义	(32)
3.1 语言的符号性	(33)
3.2 符号的类别	(34)
3.3 符号系统	(35)
3.4 符号的意义——符指过程	(36)
第四节 结语	(39)
参考文献	(39)
第二章 语际符号交换：翻译思维的运行模式	(42)
第一节 翻译——语言与思维的双重转换	(42)
1.1 翻译的思维过程	(42)

1.2 翻译的思维方法	(45)
第二节 翻译思维的运行模式	(50)
2.1 语言符号转换的基础——符号翻译	(50)
2.2 英汉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	(51)
第三节 英汉双语语言符号的基本转换模式	(63)
3.1 符号学的翻译原则	(63)
3.2 英汉双语语言符号转换的四种基本模式	(64)
第四节 翻译思维运行模式中英汉思维及语言差异	(68)
第五节 结语	(70)
参考文献	(71)
第三章 审美与社会意识：译者心理机制	(73)
第一节 译者审美体验的心理建构	(74)
1.1 对审美体验的理解	(74)
1.2 审美的主体与客体	(74)
1.3 对译者审美体验的理解	(75)
1.4 共鸣	(76)
1.5 移情	(78)
第二节 再创造过程中的译者心理	(82)
2.1 译者的再创造	(82)
2.2 再创造的心理条件	(86)
第三节 译者的翻译动机	(94)
3.1 认知需要	(95)
3.2 审美需要	(96)
3.3 自我实现的需要	(96)
3.4 外在诱因	(97)
第四节 译者风格与审美机能	(98)
4.1 风格的定义	(98)
4.2 审美差异	(98)
4.3 个性审美差异与翻译风格的形成	(99)
第五节 结语	(104)
参考文献	(105)
第四章 精神需求：古代佛经翻译与中华文化心理建构	(108)
第一节 汉末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状态	(109)

第二节 佛经翻译活动与读者精神需求的互动阶段	(109)
第三节 佛教理念对古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再建构	(113)
3.1 宗教精神成为意识形态内涵	(113)
3.2 禅宗：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	(117)
第四节 古代佛经翻译策略与读者大众心理的互相影响	(119)
第五节 结语	(123)
参考文献	(123)
第五章 变革动机：中国近现代翻译活动与读者集体意识	(125)
第一节 十九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状况	(125)
第二节 西方扩张动机对国人安稳心态的冲击与其求变愿望	(126)
第三节 现代文化的翻译引介与中国新文化心理的建构	(127)
3.1 民主平等自由理念的引介灌输	(129)
3.2 科学精神和科学手段的翻译引介	(130)
3.3 个体价值文学的翻译引介	(132)
3.4 建构新文化心理的漫长过程——与传统意识形态的融合	(133)
3.5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	(134)
第四节 翻译策略与读者大众接受心理的相互作用	(135)
4.1 近现代翻译代表人物及其翻译策略与读者大众的接受心理	(136)
4.2 戏剧翻译策略与大众接受心理的相互作用	(143)
4.3 小结	(145)
第五节 结语	(146)
参考文献	(146)
第六章 价值取向：中国当代翻译活动与读者大众心理	(148)
第一节 翻译活动与读者大众心理需求总趋势解析	(149)
第二节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新中国前三十年	(151)
2.1 共产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翻译	(152)
2.2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输出与翻译活动	(155)
第三节 翻译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服务意识——新时期三十年	(156)
3.1 流派并进、百花齐放、思潮齐涌的西方哲学与 文学翻译——20 世纪 80 年代	(156)
3.2 翻译功利性渐显——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159)
第四节 21 世纪翻译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与目的性	(160)
4.1 翻译理论大举引介与研究	(161)

4.2 实用与功利翻译	(161)
第五节 结语	(162)
参考文献	(162)
第七章 译介传承创新: 欧罗巴文化心理建构	(164)
第一节 欧罗巴文化心理自然童真时期与译介	(165)
1.1 民主政治理念译介与欧罗巴文化心理建构	(167)
1.2 译介与古代欧罗巴哲学、科学精神建构	(169)
1.3 《圣经》翻译与基督精神建构	(170)
1.4 翻译与欧罗巴文学品格的早期建构	(173)
第二节 欧罗巴文化懵懂叛逆时期与译介	(176)
第三节 欧罗巴成熟理性期与文化译介作用	(180)
3.1 政治理念的传承、借鉴与创新	(182)
3.2 宗教的角色回归与翻译	(185)
3.3 翻译传承与文学品格培育	(187)
第四节 结语	(194)
参考文献	(195)
第八章 中西文化心理差异: 误译的形成机理	(197)
第一节 误译的中西文化心理基础	(197)
1.1 文化心理的变化和发展	(197)
1.2 中西文化心理分类及差异	(198)
第二节 文化心理与翻译的关系	(203)
2.1 误译	(204)
第三节 文化心理角度的误译分析	(205)
3.1 从中西思维差异看与译者认知能力有关的误译	(205)
3.2 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偏好/英美人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偏好	(206)
3.3 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英美人偏好分析思维	(208)
3.4 中国人注重统一/英美人注重对比	(209)
3.5 从文化心理角度看文化性质的误译	(211)
3.6 中西价值系统差异引起的文化性质误译	(212)
3.7 中西伦理观念差异引起的文化性质误译的分析	(217)
3.8 中西情感系统差异引起的文化性质误译	(219)
3.9 中西审美价值系统的差异引起的文化性质误译	(221)
3.10 文化心理变化对误译的影响	(223)

第四节 结语	(224)
参考文献	(225)
第九章 品牌名翻译：文化心理学视角研究	(228)
第一节 宏观文化心理视角下的品牌命名与翻译	(229)
1.1 文化心理的相似性	(229)
1.2 文化心理的差异性	(230)
1.3 文化心理的变异性	(235)
1.4 小结	(237)
第二节 微观文化心理视角下的品牌名翻译	(238)
2.1 语音中的文化心理因素	(238)
2.2 形式中的文化心理因素	(240)
2.3 对象赋予的特殊意义与品牌名翻译	(242)
2.4 小结	(249)
第三节 结语	(249)
参考文献	(250)
后 记	(252)

绪 论

第一节 学科范畴与研究任务

翻译心理学(*Psychotranslatology*),亦称心理翻译学,是从普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等应用心理学的角度,以科学和文艺的方法对翻译现象、翻译活动、翻译行为、翻译过程、翻译原理进行阐释、论述、分析、诠释,从而试图揭示翻译的本质、以求得到翻译学意义上的理论总结的一门交叉学科。翻译心理学涵括宏观翻译心理学和微观翻译心理学,前者是从宏观的视角对翻译现象、翻译原理借助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的原理进行广义的、归纳性的研究,而后者则是从微观的视角对翻译行为、翻译过程凭借普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等的理论进行狭义的、分析性的研究。

翻译是一种心理活动,是译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的广袤无垠、时空无限的融合交汇的结果,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孤心苦诣,是 *One shade the more, one ray the less* 的品析鉴赏,也是 *Hills peep o'er Hills, and Alps on Alps arise!* 的万丈豪情。译者的情思、好恶、性情,译者的动机、志向、品格,都在每一篇译作里体现。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自然会对翻译具有启发意义。

翻译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一个复杂的心理和生理过程,人类所具有的高级思维能力使得翻译行为成为可能。这种思维活动跨语言、跨文化而显得格外地复杂、多变,难以把握。故此,要研究翻译行为,非借助思维科学不可。这必然涉及脑科学、神经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符号学、信息科学等众多学科的综合。

翻译是一门运用语言的艺术。人类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细微,其语汇数量、结构复杂度和表达的难度以几何级数增长。所以要达成语际的纯熟运用,非成为语言艺术家掌握高超的技巧不可。只有配备了复杂高级大脑的人类才具备这种能力,也只有人类才具有高级的动机、灵感等心理活动,所以,唯有文艺心理学的方法论能窥其详。

翻译是一种为在不同个人、群体、社会之间达成沟通、理解,借助言语进行交

流、交际、互动的行为。它的功能性和目的性决定了它在社会中的有用效能和不可或缺性,其社会性尤为彰显。翻译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对社会的群体行为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受着社会思潮、社会心理的反作用,而翻译语言的采用也会受不同时期的流行语言、不同地域语言的影响。所以,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原理适用于对其进行功能性研究和目的性分析。

翻译是文化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一项极其古老的文明活动,它几乎与人类文明史同时诞生。中国的译事开始于 3000 年前的周朝,而西方的翻译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原始部落之间的彼此往来,先民的互通有无,各个时期典籍的传播及至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技、政治、经济的频繁交流都仰仗翻译来实现。毫不夸张地说,翻译对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进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波拉德(A. Pollard)在论述《圣经》翻译的重要意义时说:“翻译如同打开窗户,让阳光照射进来;翻译如同砸碎硬壳,让我们享用果仁;翻译如同拉开帷幕,让我们能窥见最神圣的殿堂;翻译如同揭开井盖,让我们能汲取甘泉。”^[1]没有翻译,再伟大的思想也无法交流,再强大的国家也不免故步自封,人与人之间也免不了隔阂、猜忌和冲突。翻译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果仁和甘泉,还是人类思想和精神的阳光与空气。翻译活动使各个民族摆脱狭小的地域限制成为可能,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增进了不同价值观念的借鉴和交流。由翻译带来的不同文明成果的交汇有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和平共处,并同时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和繁荣。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今日世界,翻译都对人类文化的交流,对不同文化的相互砥砺、共同发展,对不同人群的文化心理的形成、塑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所以,文化心理学当仁不让为翻译研究洒下发微探幽的光辉。

翻译心理学不仅涉及众多的人文学科,而且也涉及自然科学,具有强烈的兼容性、广泛性,从最本源的思维到最宽广的语言应用、从人类活动动力的文化心理到人类社会庞大组织体系的心理机制、从文艺审美到情感、发展需要,对翻译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第二节 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

随着 21 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之间语际交流的频率、效度以及不同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对语言翻译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高。如何使翻译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如何认识、解析翻译的本质和特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理论问题。相对于其

他方面很多的翻译理论研究,从心理学角度才能更好地更全面地解释翻译现象、理解翻译活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心理动因是绝大多数人类活动的起点,更是翻译活动的肇始。首先,语言本身就是思维活动的外壳,翻译行为更是心理需求的结果。翻译语言、文本、风格、题材的选择都离不开某种个人的心理需求,或为生存、或从大众、或达审美、或通心智,也同时在满足社会的心理需求,或求变革、或树新风、或趋思潮、或慰心灵。广泛地说,翻译不仅仅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间交流的需要和手段,而且是革除旧文化、建构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必要途径。所以,从心理视角研究翻译学将从最深刻的层面剖析翻译活动、解释翻译现象、描述翻译过程和探究翻译行为。同时,由于基于心理学的诸多应用领域的研究成果,翻译心理学不仅对翻译学进行纯人文的研究,而且从一个方面成为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

本研究旨在以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学科原理对数千年来的翻译现象、翻译活动进行宏观的观照,以总结特定时期某种文化心理建构的特征和翻译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根据普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的原则对翻译行为、翻译过程进行微观的研究,以探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特性。具体的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是个人性、个体性的,但也受社会性、群体性的制约;而翻译现象和翻译原理是广义的,但却是诸多个体行为的总结,不免蕴含个人的特质,所以只有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探讨才可能是完整的。本研究将以应用心理学的各种理论为依托,提出翻译学的新认识新观点,以求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翻译心理学能更好地从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范围对翻译现象进行入微入理的剖析,也更能发掘出翻译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本研究还将分析和诠释诸多英汉翻译实用例证(比如外国电影译名、商用品名译名、误译动因)的文化心理机制,并提供文艺美学认知和判断,给译品读者的理解提供帮助,给译者的语言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节 翻译心理学研究任务与方向

任务之一:探索思维活动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

在翻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畴中,什么是翻译的本质过程这个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我们知道,翻译不仅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作品,更有一个复杂的翻译过程。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一书中曾专门作过阐述,说翻译一词用于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一定过程的结果’,即译文本身;二是指‘翻译过程本身’,即翻译这一动词表示的行为,而这

一行为的结果则是上面说过的译文。”^[2]可见,忽视翻译过程的翻译理论是不完整、不健全的,对翻译过程进行研究对于完善翻译理论和提高翻译水平都是十分有益的。那么,翻译的过程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翻译始于一种语言,终于另一种语言,似乎只是一个语言之间的转换。然而,深究这种转换的实质,我们发现,任何语言转换都是在译者的大脑指挥下发生的,用谭载喜的话说,“从原文到译文的转换都只能在个人的大脑里进行。……真正的转换却似乎只是一刹那即可完成。”^[3]人的大脑里是不是存在一个转换机制,“好比铁路的道岔扳子,一扳,某个信息就从一种语言转移到了另一种语言?”^[4]从个体来看,译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以及翻译态度直接作用于翻译结果,产生出不同风格的作品;而从整体来看,不论是什么样的翻译,都需要经过译者的思维才能实现语言的转换,并且,由于人脑的共同物质基础,这种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性,因此,我们认为,“翻译活动的过程,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是一种思维过程,并且是一种有别于任何其他语言活动的思维过程”。^[5]翻译过程,无论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际转换过程,还是跨文化交际学所说的文化心理的转换过程,其核心和本质都是译者的思维过程。

在学者们构建的翻译学理论框架中,无一不把翻译思维放在了重要的地位,认为它是翻译活动中起本质和基础作用的东西。如刘宓庆把翻译思维列在翻译的基本理论中^[6];彭卓吾则把译者的思维机制问题放在了基础翻译学的范畴,并给予高度重视^[7];董史良在《翻译的思维问题》一文中指出,“翻译毕竟是人脑的思维活动,离开了人的思维,就无所谓翻译。因此,从思维科学角度来研究翻译应该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的途径”^[8];而许钧把翻译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中翻译活动的基础层次便是人类的思维,他认为“从本质上说,翻译活动是思维活动,一项特殊的思维活动”^[9];巴尔胡达罗夫也说:“翻译是一种心理过程,即大脑皮层活动的某种形式”^[10];等等。的确,在翻译的过程中起着本质作用的正是译者的思维机制。人的大脑如何将一种语言符号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符号,这个看似浅显得近乎常识,却又深奥得不可捉摸的问题已经成为建立翻译学所必不可少的一项研究内容。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虽然使不同民族的人们在用各自的语言交流思想时遇到了障碍,但是人类所面对的是同一个客观世界,人脑共同的物质构造使得思维——这一人脑的机能具备了全人类性,因此各民族虽处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对客观事物本质性认识的思维活动是一致的。正是这种思维普遍性成为语言转化的客观条件。翻译思维是人类诸多思维种类的一种,借助人类普遍的思维机制来研究翻译思维及语言符号的转换机制不仅具有客观的基础,而且这种普遍的翻译思维作为翻译中语言转换的深层基础,对其进行研究也将有助于翻译语言

层面的转换。因此,虽然翻译思维的研究由于心理学、神经学、认知学、思维科学等相关科学的局限而起步较晚且困难重重,但其可行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人类的思维过程实际上就是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相互转化,即人脑中语言符号编译机制发生作用的过程。语言符号是人类多元符号系统中最常见、最复杂的一种,包括音素、音节、词素、词、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语篇。在对翻译思维的研究中,它起到两个作用。首先,语言符号是翻译思维的材料和工具。思维的进行依赖于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各种符号,“进行中的思维活动,无非是语言、符号的操作活动,从思维的前提得出思维的结论,在现实性上,就是进行一种符号的组合、转换、再生等等的过程”。^[11]翻译思维也是一样,当语言符号通过视神经、听神经或触觉神经被传送到我们的大脑后,大脑的某些部位就要对其进行处理和转换,把它们转变成大脑思维加工可以运用的材料。人们借助于这种语言符号编码的活动手段,进行语言和思维的转换。只不过,翻译思维比起其他思维来说更加特别、复杂,因为从原语的创作开始到译语的完全表达这一过程中,翻译思维经历了两次或更多次的符号转换:首先是把原语的语言符号送入大脑进行编码加工,接着再将思维加工的结果转换成译语的语言符号形式输出大脑。如果原语的文本也是经过翻译而来,那么这个完整的从原始文本到最后译语文本的翻译过程则要经历多次的思维和语言符号的转换。其次,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也是翻译思维——这个内部活动的外在表现和具体化,二者是统一的,是个体和整体、具体和抽象的关系。翻译作为语际转换的过程,首先涉及的是语言问题,语言符号在其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英汉双语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就是翻译思维的外壳,处处体现着英汉互译中翻译的思维活动。

思维科学无疑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在我国只有短短三四十年的历史;^[12]如果把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首先兴起的认知科学也算作思维科学,也才只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同时,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问题至今还没有定论,这决定了对翻译思维进行科学的研究,其起步较迟。虽然人们对于翻译思维的重要性早有认识,但是由于受制于相关科学的发展,同时人类对自身大脑的认识本来就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此,对翻译过程中译者思维规律的探索仍然是个难题,就连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也无可奈何地说:“到底是什么使译者进行翻译的,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13]虽然这个问题深奥难懂,但它毕竟是翻译学的一个本质问题,许多学者仍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除了前面所说的刘宓庆、彭卓吾、许钧、董史良等,还有一批学者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此做出了贡献。总的来看,目前我国对翻译思维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一是将翻译思维纳入了翻译学理论框架并确立了其在翻译学研究中的基础和本质地位;二是认识到翻译思维研究实际上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需要借助其

他学科,尤其是国外的认知科学及国内的思维科学的研究成果;三是确定了翻译是信息转换的过程,而大脑是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器官;四是总结出了翻译中的三种思维方法,即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到目前为止,国内有刘绍龙编著的《翻译心理学》,李奕、刘源甫著的《翻译心理学概论》及颜林海的《翻译认知心理学》等专门论述翻译思维的学术专著,对翻译思维进行了各个角度的研究,但显然学者们进行的不同理论基础上的论述并不是终极解释,正如本研究仅仅是建立在诸家理论之上的一家之言而已一样。这在一方面说明了任务的艰巨性,同时也预示着这一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另外,在具体到英汉双语语言符号的转换时,本书借用符号学的部分理论进行探讨。符号学已成为当今国内外语言和翻译研究的又一种新兴科学方法,在国外以 D. L. 戈雷女士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关于 C. S. 皮尔士的符号学》一书为代表,在国内以柯平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为代表。两位学者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将符号学原理与翻译相结合。然而,戈雷女士的著作还停留在理论水平,较难运用到翻译实践;而柯平的著作虽采用了符号学三种关系的概念,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翻译实例中,但也只是泛泛而谈,没有深究符号学的内在本质。总之,目前运用符号学理论进行翻译研究的局限在于无法将理论和实践完全有机结合起来。

对翻译思维以及语言符号转换的研究刚刚起步,还有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在翻译思维方面,必须更加深入、细致地挖掘翻译思维过程的内在机制,并提出一套翻译思维过程模式和翻译的思维方法,同时,具体运用英汉双语语言符号的转换来论证翻译思维机制的作用过程。其次,在语言符号转换过程方面,作者试图将符号学的理论与翻译转换有机结合,从符号学三种关系——语义、句法和语用的角度,分别对字、词、句等转换层面进行具体分析,并从符号学视角提出了英汉双语语言符号的四种基本转换模式。

研究任务之二:译者主体实施翻译行为的心理活动

翻译是人类极其复杂的一种智力活动;自“巴别塔”倒塌之后,语言的统一性遭到破坏,出现了“地不同,语不通”的局面,翻译也应运而生。无论是何种语言的翻译,也不管是何时何地的翻译,亘古不变的是翻译始终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交流活动,其主体始终是人。尽管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机器翻译已崭露头角,但以目前的发展来看,电脑恐怕永远也代替不了人脑。万物之灵的人没有屈服于上帝的意旨,没有了统一的语言,却造就出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语言文化,并且他还掌握了变通的方法进行交流,这便是翻译。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这一史无前例极其复杂的智力活动的主体,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与人类另一复杂的智力活动——创作的主体同样的公平对待。前者是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却名不显达的译

者,后者是名留千古、万人景仰的作者。古时在西方,译者多数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他们的名字在版权页上印得很小,甚至根本不印,所得报酬也十分微薄,一般人根本不关心译者是谁。中国的情形比之略好。人们也只将作者挂在嘴边,对译者却置若罔闻。译者向来不受重视,也得不到中肯的评价。之所谓“戴着镣铐的舞者”,“叛逆者”,“透明人”,统统将译者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殊不知“作者文章千古事,唯经译者留其名”。罗新璋在论及译者时说:

……须知译本的优劣,关键在于译者……翻译理论中抹杀译者主体性论调应少唱,倒不妨多多研究如何拓展译者的创造天地,于局限中掌握自由。大凡一部成功的译作,往往是翻译家翻译才能得到辉煌发挥的结果。泯灭译者的创造生机,只能导致译作艺术生命的枯竭。今后的翻译理论,自应有译者的一席之地!^[14]

译者的重要性是不能也不应该忽略不计的。译者的地位如此重要,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其心理因素会对翻译活动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译者的心理研究也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傅雷在论及“传神”时说:“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15]这里所提到的“敏感之心”和“热烈之同情”即是心理因素。译者的兴趣爱好,意志品质,个性气质等都会在翻译活动中打上深深的烙印,决定翻译的动机,左右翻译的过程,影响翻译的结果。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变化有什么规律,对翻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是什么影响了他的心理,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以前,翻译语言学派和翻译文艺学派长期占据翻译研究的主导地位,两者都只关心翻译的具体方法,关注文本——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之间的转换研究,即对翻译客体的研究,很少有人关注译者——翻译的主体。但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和以人为本思潮的复归,对人自身的关注与研究成为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焦点。翻译作为译者的创造性活动,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到其心理因素的影响,它促进或制约甚至是阻碍着译者的翻译活动。因此,译者的心理研究势在必行。对译者的心理研究有助于提高译者的地位,加深对翻译这一复杂活动的多方面的了解,也有助于产生出更加优秀的译者、译作。研究翻译,不能不研究译者,研究译者不能不研究译者心理。译者心理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不言而喻了。

长期以来,翻译的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各领风骚,互争高下。翻译理论家就翻译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长期争论不休。而随着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和人文思潮的复归,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两者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